

现代国家建设及中国政治 －经济转型的逻辑

汪庆华*

【摘 要】论文拟从 1978 年以来中国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解释我国政治－经济转型的逻辑，并试图揭示出我国的政治发展路径。论文认为，现代国家建设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动发起并引导的，目的是通过在国家的性质、职能、能力、干预范围等方面做出调整以有利于市场的引入、扩张和运行，并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论文从结构和治理方式两个向度来考察改革时期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认为，中国国家已转型为一个吸收了当前发达国家先进治理手段的现代行政国家和监管国家。这个基本成功的国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它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和持久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国家能力和党的执政能力，使党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种挑战。经济增长还为党的领导提供坚实的合法性来源。

【关键词】中国国家 现代国家建设 治理方式 市场转型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10）01－0055－26

一、前 言

关于 1978 年以来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逻辑和动力机制、政治发展的得与失，以及政治转型的前景等问题一直是海外中国问题

* 汪庆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上海财经大学 211 工程项目（编号：2010330023）。

专家的关注点。从1990年代初开始，海外先后出现过“中国崩溃论”、“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以及“北京共识”等不同流派。具体到海外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我们可以根据他们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评价及对未来政治走向的预期将之分为三类：悲观主义的（Bakken, 2004; Friedman, 2006; Goldstone, 1995; Pei, 2003, 2006; Waldron, 1998）、乐观主义的（Naughton & Yang, 2004; Yang, 2003, 2004; Li, 2007）和介于二者之间的（Brzezinski, 1998; Dickson, 2003; Nathan, 2003; Shambaugh, 2008: 39、174 - 181）^①。

概括地讲，悲观主义者认为当前中国国家处于一个持续衰败和恶化的状态，国家能力在持续衰退，治理危机和潜在的大规模社会不安定在持续积累，党和国家对社会逐渐失去控制。而这些问题在乐观主义者看来虽然都存在，但其范围和程度都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而且由于中国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改革和主动调整，中国的政治演进总的看是在朝积极方向前进的。第三个流派主张在对中国30年来的政治发展作判断时，不宜过于匆忙或过于片面，既要看到中国政治体系的主动积极调整、治理能力的改善或提高，也要看到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不过，虽然海外学者们的观点可分为不同类别，但他们有下面一个基本共识：尽管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基本成功的（如 Naughton, 2000: 49），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实质性进展不太多（如 Oksenberg, 2001: 25）。

本文拟从1978年以来中国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解释我国改革以来政治 - 经济转型的逻辑和动力机制，评判我国政治发展的得与失，分析我国政治转型的前景，并对海外学者的相关观点进行批判性分析。必须指出的是，鉴于3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复杂性，

^① 请见几个相关的大辩论：Symposium: Will China Democratize? (1998); Symposium: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2003); Forum: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Today. (2001)。另参见沈大伟写的相关文献综述（Shambaugh, 2008: 23 - 40）。本文这里仅选取有代表性的观点作简要勾勒。

任何一个试图理解或解释中国变革的学术努力和分析视角都是存在局限性的（参见 Baum & Shevchenko, 1999: 333 – 334），作者这里的尝试当然也不例外。本文试图做出的贡献包括：1. 在对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尤其是中国国家建设或转型方面）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将之介绍给国内学术界。2. 本文首次提出，在考察中国的国家转型时，可以从国家的结构和治理方式两个向度来进行。目前海内外学者对中国国家结构方面的转型已有较为成熟的讨论。还有很多零散的关于中国国家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的手段的变化，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国家与社会（如公民、非政府组织或其他民间团体等）间互动问题的研究，本文尝试以“国家的治理方式”（modes of governance）这个分析工具来对之进行梳理。3. 延伸对中国国家建设问题的研究。本文拟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介入学术界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相关辩论，试图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改革初期现代国家建设的启动

改革初期中国国家的特点包括：1. 以高度中央集权、中央计划和群众运动等为主的行政原则和治理方式。借用著名学者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术语就是改革前的中国国家是“以计划为意识形态”的（a “plan ideological” state），即“生产方式的国家所有制、国家制定计划、官僚对目标的设定等都不是针对一个发展目标的合理方式；它们本身就是根本价值，不会因其无效率或无效果的证据而受到质疑”（Johnson, 1982: 18）。2. 以受过很少现代教育并缺乏行政技能、但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者为国家官僚体系的主干。3. 以对党的忠诚度、阶级背景、关系、派系政治、资历和经验等为标准来选拔和奖惩官僚（Harding, 1981, 1987; Lee, 1991）。

为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经济现代化的需要，邓小平同志分别在1980年8月和1982年1月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

改革”和“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重要讲话^①。在第一个讲话中，邓小平指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党应该适当从政府的工作领域退出，让政府承担具体执行政策和促进经济建设的职能。第二个讲话则强调政府机构的高效率，以及提高干部队伍的教育程度和专业能力的革命性意义。邓小平实际上是在赋予政府在推进经济建设过程中更重要的角色，并且相应地提出了党和国家的适度分离及我国必须建设现代国家的战略方向。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渐次展开。

本文认为改革时期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的：现代行政国家的构建、“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式的治理改革、监管式国家（regulatory state）建设、法律体系的建设 and 人大制度的发展，以及军队的职业化和现代化等。本文将从国家在结构和治理方式两个向度上的转型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本文提出的“治理方式”这个概念从英文字面上看和下列概念同义：政策手段（policy instruments）、政策工具（policy tools）或政府工具（tools of government）（OECD，2002b）、公共行为的工具（tools of public action）（Salamon，2002）、治理形式（forms of governance）（Pierre，2000）等。但这些公共管理类文献的相关讨论多偏重技术层面^②。而本文对“治理方式”概念的处理（包括对其的分类）是在抽象的层面上展开的，与其他一些政治学者的处理手法类似（比如 Burrell，2001：1-10；Naughton & Yang，2004：1-25）。

① 见邓小平同志分别在1980年8月和1982年1月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重要讲话（邓小平，1983）。

② 比如，经合组织（OECD，2002b：52-54）列出了目前其成员国通常使用的20多个政策手段（policy instruments）。另外，根据萨拉蒙（Salamon，2002：21）的分类，公共行为的一般工具（the “common tools of public actions”）包括：直接行政、社会管制、经济管制、合同、拨款、直接借贷、贷款担保、保险、税式支出、收费和付费、责任法、政府公司以及凭单制等。

三、国家在结构向度上的转型

自 1978 年以来，中国国家在结构方面的转型包含政府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和建立新型的监管式国家组织等三个方面的内容。随着 1978 年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力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80 年代市场的引入和扩张，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至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国家经历着持续不断的变革。党在 1982、1988、1993、1998 和 2003 年先后发起了几轮政府机构改革（Chan & Drewry, 2001；Li, 1998；Yang, 2004；Zheng, 2004），其注意力都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改革^①。每一轮机构改革的发生都有自己特定的背景，比如说，经济改革在什么样的阶段？市场的地位如何？计划和市场间关系的争论如何？精英政治的情形如何？来自西方及国际社会的影响怎样？

从总的历史趋势看，除了通过人员裁减和放弃一些非核心的职能以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以外，贯穿机构改革的另一个主题是如何对政府的结构和职能做出周期性调整以有利于市场的引入和扩张、并促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比如 1982 年机构改革反映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变化，即党在 1982 年召开的“十二大”中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为补充的混合经济，市场开始被引入中国的经济生活中（Zheng, 2004：85）。又比如 1993 年机构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邓小平 1992 年初的“南巡”讲话及党的“十四大”精神——即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Li, 1998：22）。

最值得注意的是 1998 年的机构改革。本轮改革是要构建一个

^① 必须指出的是，政府机构改革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官僚系统也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重组、精简等改革。

能适应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行政体系。那些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从事微观经济管理的部委，被取消或合并入其他部委中。比如原有的电力部、煤炭工业部、机械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国内贸易部、国家纺织工业协会、国家轻工业协会、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等都被精简或降级成为国家经贸委的一个局级机构（Li, 1998: 25 - 33; Yang, 2004: 37 - 41）。各政府机构主要负责市场秩序的维持、部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其他宏观管制事宜。结果，1998 年的政府改革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变化很显著，造成了官僚所掌握的资源 and 承担的社会职能的数量、范围和重要性的大幅减少”（Li, 1998: 33）。著名华裔学者杨大利教授更加乐观，他认为：“随着 1998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国迎来了将一个原先习惯下达中央计划和行政指令的行政体系转化成了一个旨在迎合市场的监管式国家的最后阶段”（Yang, 2001: 37）。

另外，韦伯式官僚制被当作重要的指导原则运用于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中，包括基于特长和技能的人员录用、更多的专业化、人力资源的清晰分工以及奉行正式的规则与标准等。邓小平所强调的选拔年轻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韦伯式官僚制的精神（邓小平，1983: 286）。

更进一步地，旨在引入韦伯式官僚制的努力在公务员制度改革中得到更清晰的体现。在 1992 年党的“十四大”决定完全合法化市场经济后，随后 1993 年就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作为配套措施，旨在训练高级公务员的国家行政学院也在同一年成立。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包含 12 种职位和 15 个级别，上至国家总理、下至一般科员。它要求新被录用的公务员必须经过公开考试和竞争，择优录用；公务员们的待遇是优厚的、工作是稳定的；对公务员的管理和提级是基于其工作表现，公务员们被要求正直、廉洁、奉公守法等。总的讲，作为党的干部制度的一部分，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国家干部及广大公务员队伍的受教育水平和综合

素质，建立一个更有效率、更专业和更有能力的行政体系，以便更好地服务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运行（Burns, 2001；Drewry & Chan, 2001；OECD, 2005：53 - 74）。

从1992年开始，作为一次有意识的对西方“独立监管者模式”（the “independent regulator” model）进行学习的结果，政府逐渐在一些金融服务业（例如证券、保险、银行）和基础设施工业（比如通信、航空和电力）建立起新型的监管机构（OECD, 2002a：361 - 388，2005：275 - 300；Pearson, 2005：302，2007：721；Yang, 2004：81 - 94）（见表1）。作为这些改革措施的结果，一些学者认为一个美国式的监管国家正逐渐在中国出现（OECD, 2002a：361 - 388，2005：275 - 300；Pearson, 2005，2007；Tam & Yang, 2005；Yang, 2004：81 - 94）。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我国的监管式制度建设，这方面本文在后面讨论我国的“监管式治理”时还将有所涉及。

表1 关于几个中国经济命脉工业的监管机构

监管机构	监管的范围	成立时间	原来的主管国家机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金融服务（证券）	1992	中国人民银行
信息产业部	电信、信息	1997	邮电部、电子工业部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金融服务（保险）	1998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民用航空局（CACC）	航空	2002	2002年改革前的CAAC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电力	2003	电力部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金融服务（银行）	2003	中国人民银行

资料来源：Pearson（2005：303）

理想的基于“独立监管者”模式之上的国家组织应有这样的特点：从制度设计上，监管机构应该既独立于它要监管的企业或相关利益团体，又相对独立于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同时监管机构的运行必须具有很高的透明度（Pearson, 2005：299、300）。从价值偏

好上看,“监管者的主要工作是为市场参与者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公平地运用规则而不管那些特别的参与者是谁,从而促进竞争并消除市场失灵”(Pearson, 2005: 300; 另参见 OECD, 2002b: 11-12, 2005: 299-300; Pearson, 2007: 721、722)。在中国背景下建立基于“独立监管者”模式之上的新型国家机构,目的是将政府干预限制在“远距离的监管”上^①,使国有企业像独立的私营经济组织那样在市场中自主运行,并为所有市场参与主体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及提高监管者的专业能力和其运行的透明度等。

四、国家在治理方式向度上的转型

中国国家在结构向度上的转型是和其在治理方式向度上的转型并行的。自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来,如何建立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如何促进市场转型,一直是我国政府的一项中心任务。为达此目的,中国国家在治理方式上迅速走向合理化和现代化,这已成为一个比较明显且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这方面的发展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明显,因为过去10年来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体系,国际交流和政策学习显著增多。本文将中国国家在治理方式向度上的转型分为以下四类。

(一) 从“非正式”走向制度化及提高规则性和可预测性

改革前中国政治体系的运转很大程度上采用了“非理性”和“非正式”的模式。在很多情况下,儒家道德秩序、个人崇拜和对最高领导的绝对忠诚、基于私人间交往之上的权力关系、政治运动和群众动员、非正式权威等等因素扮演更重要角色,而去人性化的和法律化的关系、法治和正式程序等因素则被忽视(邓小平, 1983: 280-302; Boisot & Child, 1995; Harding, 1981; White,

^① 即 regulating stakeholders' behavior at arm's length。

1990)。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政治中普遍存在的“非正式”元素。在精英政治层面，派系政治、个人领导和私人关系被认为比法律和正式制度更重要（Dittmer, 1995; Pye, 1995）。同样地，在基层政治比如村级政治层面，国家的代理人即村干部与农民之间形成的“庇护 - 被庇护”之类的依附关系起重要作用（Oi, 1989）。

历史经验证实，工业革命、市场的扩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带来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的理性化，以及政府行政的官僚化。在韦伯看来，理性化和官僚化是西方世界步入现代化的一个必备前提、阶段、组成部分和结果，其特点包括：将行政管理简化成规则，并转化成非人格性和专业性，处理事务时以抽象的方式而不考虑个人特权或者世袭等因素，法律要理性系统化等。当一个社会正经历大规模、快速的现代化的时候，官僚化不可避免。它也是必需的和值得做的，因为社会在分化，社会需求日益复杂，唯有借助韦伯式的官僚制才能应对这些挑战（Weber, 1969）。中国过去30年的演进路径也部分遵循了西欧国家的历史经验和韦伯的理论，即从“非理性”和“非正式”走向韦伯式的理性化和官僚化、从人治走向法治等，国家政治生活日益制度化和常规化。

自从1978年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家代议机关在制订和修改主要法律方面扮演一个日益重要的角色，已发展成为一个我国法律制订的关键行为主体（Tanner, 1999）。为满足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客观需求，全国人大一直致力于如何修订法律和完善法律体系来“提供更高程度上的规则性和可预见性”（Lieberthal, 2004: 176）。作为结果，一个基本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法治环境已在我国出现。

瑞典学者巴勒尔（Battias Burell）认为，中国的市场转型、工业化和社会革命等已增强了法律的重要性，中国目前处在由原先的“自由裁量型治理”（discretionary）向“法治”（rule-of-law）过渡过程中的中间阶段，即“依法治理”（rule-by-law）（Burell, 2001: 70）。在巴勒尔看来，当前中国的“依法治理”已把法律视作一种

重要治理工具，这个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如果一个威权政体决心依法进行治理，……这将使公民提高对政治的可预测性”，并对政治权力的运行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尽管这种依法治理并不等同于所谓西方意义上的法治（Burell，2001：2）。

国家的精英政治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变得“更理性、更常规和更有可预见性”（Shambaugh，2001：101），而非改革前的“零和、胜者全拿的游戏”。政策制定方面，中央的政策过程已变得越来越理性，通常要经过可行性论证和试点后才做出决定，而且会向不同的社会群体征求意见。正式决策形成后，对其的执行过程会受到比以前更加严密的监控。中央还重视建设更加常态化的渠道让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社会群体能够表达他们的想法，并且中央政府会酌情根据这些反馈对其决策作一些相应的调整（Shambaugh，2001：106）。还有，国家的政治生活更趋于制度化。党和国家的中央机构都会根据宪法的规定定期召开会议；消除终身任职的退休制度也一直被有效地运用；干部人事政策强调年轻化和学历，目的是促进权力的交替和实行任期制等（Teiwes，2001：75）。

总之，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政治体系的运作日益强调程序的合法性、日益走向制度化、规则性和可预测性日益提高，在部分保留传统的强调“非正式”、强调关系和“保护人－受人庇护者”之互动模式之上又加进了相当程度的法律－理性主义元素。

（二）从干预主义到“监管式治理”^①

改革前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奉行干预主义（interventionalism）。这类治理方式指传统的命令和控制、行政管理和国家直接干预等（比如经济计划和行政指令等）。作为国家在治

^① 本节中关于监管式治理模式的讨论部分来源于约翰逊对监管国家的定义以及经合组织关于“监管式治理”的代表作（OECD，2002b：25）。约翰逊认为：“一个监管式国家或市场－理性国家关心经济竞争的形式和程序，而非其具体事务”（Johnson，1982：19）。

理方式上转型的结果：当前中国主要采用基于市场之上的监管和宏观管理等新型的治理方式。

在经济方面，干预主义式的治理方式体现在政府部门除了扮演国家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角色外，还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国有企业的日常运行实施干预，有的还直接以生产者的身份参与部门所属企业的经济活动。这些都导致了政企不分、经济活动的缺乏活力和效率低下等问题。1990年代中期后国家实施大规模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以“公司治理”的名义进行了中国式的公司改制运动。即大量大中型国有企业与原先的主管政府部委脱离，按照新的公司法实施改制，这些改制后的企业被要求按照独立的市场主体运行（Pearson, 2007: 719）。而原先的主管政府部委被精简、合并，或被要求转变其职能。1998年政府改革中40个部委中的11个被裁减掉，另有15个直接管理经济的委员会也被裁减掉，剩下的与经济有关的政府部委被要求停止对企业的微观管理，转而关注工业发展的长期指导、宏观管理和促进市场竞争（Burns, 2003）。

此外，中国政府还积极开展建立新型监管式国家机构的尝试。除前面提到的证券、电信、保险、航空、电力和银行等产业外，政府还试图在铁路、天然气等公用事业部门开展独立监管者模式的制度建设（OECD, 2005: 291 - 293）。例如：1998年当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合并组成信息产业部时，作为政企分离的一部分，中国电信从新的信息产业部中被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而信息产业部则仅被赋予政策制定和监管的功能（OECD, 2005: 292; Pearson, 2007）。

实际上，中国政府这里采取的是“监管式治理”（regulatory governance），这种新型治理模式也是当前经合组织各成员国所大力推行的（OECD, 2002b），中国的这些努力也可以被视作全球“监管革命”（regulatory revolution）的一个组成部分。如经合组织的正式文件强调，“监管政策必须有助于市场的正常运行，社会政策和保护等的执行必须尽可能用市场激励的方法，至少要尽量少地压制

和扭曲市场”（OECD，2002b：25）。监管式治理的特点是，将政府工作的重心从对利益相关者的微观事务的干预，转移到为市场发挥作用而提供相关基础设施和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进行远距离的监管”上。政府在经济竞争、社会福利保护（如环境质量、安全生产、消费者保护等）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等方面运用市场或准市场的方法，而非传统的行政手段。

（三）从全能主义到适当引入非政府的行为主体

国家在治理方式上的转型还体现在从政府大包大揽的全能主义（totalism）到政府的适度撤离，并适当引入非政府的相关利益主体、重视公民和 NGO 以及其他社团组织在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中的作用（俞可平等，2002）。中国国家的这个转型也正体现了自 1980 年代初以来全球治理改革的精神。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以来，在西方福利国家危机和传统公共行政失灵的背景下（Crozier et al.，1975；Kettl，2002），学术界和各国政府有一个关于治理范式的转变：即从强调正式的、层级制的行政管理到模糊公共与私人的差别以及强调非政府行为主体（如市场、公民、私营部门、地方社区、公民社团和传统网络等）在解决公共问题中的更大作用（Stoker，2000：256；另参见 Kettl，2000；McLaughlin et al.，2002；Minogue et al.，1998；OECD，2001）。

从全能主义到引入非政府的各行为主体，中国政府旨在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品的效率、有效性和灵敏性，既弥补国家能力的某些不足，也有利于扩大非政府行为主体的政治参与度，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国家鼓励农村实施村民自治、城市社区实行自我管理、新兴都市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等等。国家还肯定了“自然之友”、“全球村”等环境保护组织在唤醒公民环保意识、监督和批评一些地方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如俞可平等，2002；Howell，2004）。

在我国大规模工业化、国有企业的改制，以及快速的市场转型

过程中，由于很多社会保障措施的提供不够完善，越来越多的新型弱势群体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相应地，国家允许社会和公民以自发的形式成立各种社团或组织来关心和帮助这些弱势群体，这些非政府组织有：妇女团体、妇女－儿童－工人法律咨询中心、犯人妻子团体、农村发展中心与组织、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联盟、癌症患者自助团体、扶贫协会、残疾人群体，以及慈善基金会等等（Howell，2004：146）。在现阶段中国政府的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提供的角色相对缺失的情形下，让社会和 NGO 来积极发挥作用有着积极的意义。

相关的另一个代表性例子为：我国大学毕业生原来由国家按照中央计划统一分配工作，学生没有选择权。1997 年，国家将在招生和工作分配中一直试点的“计划和市场双轨”合并为一，即采纳市场化运作方法，由毕业生在就业市场自主择业，国家主要负责相关宏观政策的制定和调控等。政府的这个改革举措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政府将寻找和匹配工作的包袱和责任“推卸”给了大学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让责任人自己负起全责，政府不再大包大揽。其二，作为结果，我国大学生获得自主择业权，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的权利。大学生就业的完全市场化是国家对学生实施全能主义管理的扬弃，体现了国家从社会和公民私人生活的退出，是国家对公民个人权利的让渡（樊钉，2004；Hayhoe，1991：126）。

（四）引入“新公共管理”的一些要素——市场化、私有化和引入私营部门的运营手段

深受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和第二代“新治理”运动，以及发展中国家推行的“良好治理”的影响，中国政府引入了“新公共管理”的一些要素比如市场化、私有化和借用私营部门的运营手段等。这些措施的采纳伴随着国家从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适当撤离，以及政府的部分功能转移到非政府部门。比如政府先后在住

房、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领域采取了市场化或私有化等措施，并鼓励服务提供者之间的有序竞争（Gu & Zhang, 2006；Lee & Lo, 2001；Mok, 2003；Ngok, 2006；OECD, 2003；Wong & Flynn, 2001；World Bank, 2005）。又比如律师制度的现代化和私有化个案。中国律师制度的改革旨在建立一个独立、自我管理的律师行业，律师从原来的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被重新定义为私人法律执业者，以为公众提供服务而谋生（Zhu, 2004）。下面以高等教育为例做进一步的展开。

改革初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完全是中央集权和国家主导的。教学方案和课程设计、教材的编写、学生的录取、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学校财政及内部运营、教职行政人员的录用和管理等等，都由教育部负责。完全由国家负担的是学生的学杂费、医疗保险及一部分生活开支。省级和地方教育部门仅仅是中央政策的协调者。

经过 30 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已采纳了许多市场导向的措施。为弥补国家拨款的不足，各高校自己通过各种类似商业企业的盈利活动等来获得维持其日常运营的资金，比如开办校办工厂，对社会和企业开展专项培训，建立与企业 and 工业的各种联系等。最值得关注的是引入“使用者自己必须交费”的原则。从政府的角度看，“实行学生缴费上学的制度，改变了多年来由国家‘包学费’的格局，这无疑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改革。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不应该全部由国家负担办学经费；应该实行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受教育者要负担一部分培养费用。这是因为，非义务教育特别是高等学历教育不是全民享有的，是给少数人提供的机会，而权利和义务应该是平等的”（姚启和，2002：93）。学生所交的学杂费在 1993 年高校经费来源结构中所占比例仅为 7.68%，而在 2002 年则达到 26.94%， “近年来，社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已迅速增加，接近总经费的一半”（康宁，2005：119）。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提供者或渠道也开始走向多元化，比如民办大学和国有民办的二级学院等不同形式的私营大学的出现。高校还

主动根据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就业形势的变化以及学生的需求而适当调整课程和专业设置，类似计算机、金融、会计、英语等实用性强的专业和课程很受欢迎。另外，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对高校实施企业式的管理的做法，比如重视大学的表现，开始建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相关标准和措施等^①，对高校及高校教师的绩效进行评估，对所谓终端产品即学生的重视、以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即就业率来评价和管理学校等等。

上面概述的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措施本质上都符合“新公共管理”的经典原则（参见 Bridges & McLaughlin, 1994; Hood, 1991: 4-5; Grand & Bartlett, 1993; Mok, 2003; Ngok, 2006; OECD, 2003; World Bank, 2005）。

五、从现代国家建设看我国政治－经济转型的逻辑和中国路径

综上所述，国家在结构向度上的转型旨在通过提供一个健全的制度基础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一方面，国家在治理方式向度上的转型是国家结构转型的伴生物，比如：因为政府机构改革和公务员制度建设中引入了韦伯式官僚制元素，国家行政体系的运行走向理性化；因为新建立了一些监管式国家机构，“监管式治理”也随之被介绍进来。另一方面，它也是国家为促进建立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而主动采取的战略举措，这可从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呈加速发展趋势（比如1990年代初以后引入“新公共管理”和“监管式治理”）得到印证。以一句话概括：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使命是服务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市场经济在我

^① 比如应中国政府的请求，OECD撰写的关于如何管理高等教育质量的建议（OECD, 2003: 47）。

国的建立和良好运行。

总之，中国国家在结构和治理方式两个向度的转型是成功的。一个法律－理性主义的韦伯式官僚制已在我国基本成型，中国国家已具备现代行政国家和现代监管式国家的一些制度要素。同时，我国还借鉴吸收了当前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治理手段。成功的现代国家建设为我国的市场经济转型提供了相关的国家能力、为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础（Li, 1998; Naughton & Yang, 2004; OECD, 2005; Pearson, 2005; Yang, 2004; Zheng, 2004）。换句话说讲，没有现代国家建设，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会建立起来。如果引入比较视角，即将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简称“前苏东国家”）在1990年代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叶利钦执政时期的俄罗斯）做参照物，我国的这条成功经验尤显珍贵。原有政治体系崩溃后，前苏东国家都面临国家重建的历史任务。在面临严重的治理危机和国家能力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前苏东国家采取“休克疗法”、企图快速地将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Yang, 2004: 297 – 299; Zheng, 1997: 3）。历史的视角也给我们同样的启示，正如波兰尼（Karl Polanyi）指出的，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绝非由市场的扩张所自然形成的，西方现代早期在由众多孤立的市场向一个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国家扮演了积极主动的关键角色，现代国家建设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形成和良好运行的必备条件（Polanyi, 2001: 60）。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同时存在“太多国家”（too much state）和“太少国家”（too little state）的问题，前者指发展中国家通常强调中央集权和国家干预主义，解决之道在于如何调整国家活动的范围，后者指国家能力缺失，比如不能有效地形成和实施政策以及履行日常的行政职能等，解决之关键在于怎样增强国家能力（Fukuyama, 2004: 7; Grindle, 1997: 3）。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国际发展和援助组织认为发展中国家应重点关注怎样解决“太多国家”的问题，他们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即自

197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自由化和“新公共管理”运动而开出了这样一剂药方（即“华盛顿共识”）：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将国家部分职能转移到市场和私营部门中去。但实践证明该药方是失败的，国际社会从1990年代中期后就意识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解决“太少国家”的问题更迫切（Grindle, 1997: 3 - 5; Fukuyama, 2004: ix、5），市场化、去管制化和私有化必须同时伴随着国家能力建设和国家在某些方面干预的加强（如国家公务员的行政技能、行政伦理和专业知识，监管能力、执行能力、维持市场秩序的能力等）。相比较而言，中国路径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同时解决“太多国家”和“太少国家”这两方面的问题，前者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主动探索、推动我国由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者表现为我国政府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前提下^①，积极学习海外先进的治理手段，并全方位地开展现代国家建设。

需要强调的是，改革时期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党主动发起并引导的。虽然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初期勾勒出了党和国家的适度分离及我国必须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战略，但邓小平又明确指出，这样做的根本目的“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邓小平，1983：300）。现代国家建设是党在国家的性质、职能、能力、干预范围、与社会及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所作的主动调整，其性质是自上而下的；但同时，国家转型也是我国市场转型的客观要求，它也是党根据我国市场发育和扩张的程度对国家结构和治理方式作出的主动调整（参见Wang, 2006）。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双向互动，国家转型和市场转型的双向促进，乃是我国1978年以来经济持久高速增长

^① 在讨论1980年代中国政府接受世界银行针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贷款及其他相关援助时，海霍（Ruth Hayhoe）写道，“中国政府坚决要求确保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条款的控制”（Hayhoe, 1989: 187）。

长的关键所在。

除了促进市场转型和经济发展，现代国家建设的积极意义还在于它增强了国家能力、党的执政能力和合法性。作为国家建设的结果，中国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增强了，改革前的“只有强壮的大拇指而无其他手指”（strong thumb, no fingers）的情形被根本改变（Lindblom, 1997: 65 – 75；另参见 Naughton & Yang, 2004）。正是因为有了一个与时俱进的现代化国家机器，党才有能力应对我国30年来各种错综复杂的挑战，牢固地维持着其执政地位。而且，持久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又为党的领导提供坚实的合法性来源。

本节以上的讨论可以用图1来形象地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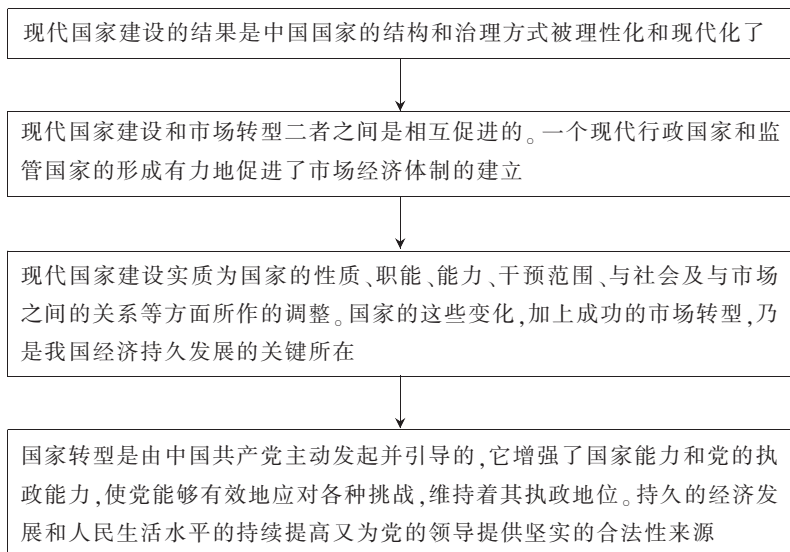


图1 从现代国家建设看我国政治 - 经济转型的逻辑

图1所勾勒的实际上也是改革时期中国的独特发展路径，它与前面提过的1990年代的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现代早期的西方和1980年代初以来的发展中国家等三个案例相比之下，避免了其他

发展模式的一些失败的地方，也吸收了其他案例的一些成功之处。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土壤中，基本成功的国家转型实际上就是我国政治发展成就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经由现代国家建设来促进市场的扩张、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的持久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等，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

海外关注中国政治的学者、尤其是那些悲观主义者，过于依赖西方经验来观察中国政治。但正如本文讨论的，由于基本成功的现代国家建设，中国的国家能力不是衰退而是增强了，自 1978 年以来中国的发展路径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 – 经济转型是基本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资深的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曾这样告诫他的学术同行：“在过去我们多次地看到，中国已经设法应对了一个又一个的挑战。他们的成功并没有按照外国学者所说的‘必须’怎样怎样去做以避免灾难性结局。”（转引自 Zhao, 1998: 58）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曾对“中国崩溃论”提出批判，认为中国政治精英应对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将会是“智慧的和现实的”（intelligent and realistic）（Brzezinski, 1998）。

最后，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仍然任重道远。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各种社会矛盾比较集中、尖锐，我们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和增强国家能力以稳妥应对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创造有利于深层结构改革、产业结构升级、经济持久发展的安定环境。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如何克服治理危机乃是我国政府的一项关键挑战，这点著名华裔学者王绍光教授和裴敏欣博士以及其他一些海外学者，还有以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为代表的诸多国内学者都已经反复地告诫过（如胡鞍钢等，2009；Pei, 2002, 2003, 2006 Wang, 2006；Yang, 2003）。中国共产党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除了继续重视国家建设外，党还一直积极进行自身的转型和执政能力建设，比如 2001 年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理

论旨在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Dickson, 2006; Holbig, 2004)、2004 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党还出台了“关于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 (Shambaugh, 2008: 128 - 160) 等。笔者很认同胡鞍钢教授的呼吁,“党的纲领和中心工作应该转向以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为中心,开创制度建设时代” (胡鞍钢, 2009: 10)。

参考文献

- 邓小平 (1983). 邓小平文选. 上海: 人民出版社.
- 樊钉 (2004). 变革中的中国大学生就业制度. 载曾湘泉等著《变革中的就业环境与中国大学生就业》.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胡鞍钢 (2009). 第二次转型: 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制度建设为中心 (第一版前言). 载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主编《第二次转型: 国家制度建设 (增订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 (2009). 第二次转型: 国家制度建设 (增订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康宁 (2005). 中国经济转型中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制度创新.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姚启和 (2002). 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 载姚启和主编《90 年代中国教育改革大潮丛书: 高等教育卷》.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俞可平等 (2002).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Bakken, B. (2004). Norms, Values and Cynical Games with Party Ideology. In Brødsgaard, K. E. & Zheng, Y. Eds. *Bring the Party Back in: How China is Governed?*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 Baum, R. & Shevchenko, A. (1999). The “State of the State”. In Goldman, M. & MacFarquhar, R. Eds. *Paradoxes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isot, M. & Child, J. (1996). From Fiefs to Clans and Network Capitalism: Explaining China's Emerging Economic Orde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1 (4): 600 - 628.
- Bridges, D. & McLaughlin, T. H. Eds. (1994). *Education and the Market Place*.

London; Falmer Press.

- Brzezinski, Z. (1998). Disruption without Disintegr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9 (1): 4 – 5.
- Burell, M. (2001). *The Rule-Governance State: China's Labor Market Policy, 1978 – 1998*. Doctoral dissertation, Uppsala University, Sweden.
- Burns, J. P. (2001). The Civil Service System of China: The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 In Burns, J. P. & Bowornwathana, B. Eds. *Civil Service Systems in Asia*.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Burns, J. P. (2003). Downsizing the Chinese State: Government Retrenchment in the 1990s. *The China Quarterly*, 175: 775 – 802.
- Chan, C. P. & Drewry, G. (2001). The 1998 State Council Organizational Streamlining: Personnel Reduction and Change of Government Func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 (29): 553 – 572.
- Crozier, M., Huntington, S. P. & Watanuki, J. (1975).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Report on the Governability of Democracies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Dickson, B. J. (2003). Threats to Party Suprem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1): 27 – 35.
- Dickson, B. J. (2006). 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 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 In Dittmer, L. & Liu, G. Eds. *Domestic Politics in Transition: China's Deep Reform*.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 Dittmer, L. (1995).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34: 1 – 34.
- Drewry, G. R. & Chan, C. P. (2001). Civil Service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other Mirage of the New Global Paradigm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67 (3): 461 – 478.
- Forum: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Today. (2001). *The China Journal*, 45: 20 – 142.
- Friedman, E. (2006). A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In Zhao, S. Ed. *Deba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Rule of Law vs. Democratization*. Armonk; M. E. Sharpe.
- Fukuyama, F. (2004). *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 Centur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oldstone, J. (1995). The Coming Chinese Collapse. *Foreign Policy*, 99 (3): 35 – 52.
- Grindle, M. S. Ed. (1997). *Getting Good Government: Capacity Building in the Public Sector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u, E. & Zhang, J. (2006). Health Care Regime Change in Urban China: Unmanaged Marketization and Reluctant Privatization. *Pacific Affairs*, 79 (1): 49 – 71.
- Harding, H. (1981). *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 – 197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ding, H. (1987).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Hayhoe, R. (1989).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the Open Door*. New York: M. E. Sharpe.
- Hayhoe, R. (1991). The Tapestry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Epstein, I. Ed. *Chinese Education: Problems, Politic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 Holbig, H. (2004). The Party and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PRC. In Brødsgaard, K. E. & Zheng, Y. Eds. *Bring the Party Back in: How China is Governed?*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 Hood, C. (1991). A Public Management for All Seas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69: 3 – 19.
- Howell, J. (2004). New Directions in Civil Society: Organizing around Marginalized Interests. In Howell, J. Ed. *Governance in Chin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Johnson, C.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 – 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ttl, D. (2000). *The Global Public Management Revolution: A Repor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Kettl, D. (2002).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r Twenty-First 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 Lee, H. Y. (1991).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e, P. N. S. & Lo, C. W. H. Eds. (2001). *Remaking China's Public Management*. Westport: Quorum Books.
- Li, C. (2007). China in the Year 2020: Three Political Scenarios. *Asia Policy*, 4: 17 – 29.
- Li, J. (1998). *Bureaucratic Restructure in Reforming China: A Re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Power*.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Lieberthal, K. G. (2004).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2nd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Lindblom, C. E. (1997).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 McLaughlin, K., Osborne, S. P. & Ferlie, E. Eds. (2002). *New Public Management: 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 London: Routledge.
- Minogue, M., Polidano, C. & Hulme, D. Eds. (1998). *Beyond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Changing Ideas and Practices in Governance*.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 Mok, K. H. (2003). 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Restructuring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22 (2): 117 – 129.
- Nathan, A. (2003).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1): 6 – 17.
- Naughton, B. (2000). The Chinese Economy: Fifty Years into the Transformation. In White, T. Ed. *China Briefing 2000: The Continuing Transformation*. London: An East Gate Book.
- Naughton, B. J. & Yang, D. (2004). Introduction. In Naughton, B. J. & Yang, D. Eds. *Holding China Together: Diversit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ost-Deng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gok, K. (2006). 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In Pang, N. S. Ed. *Globaliz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 Change and Refor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OECD (2001). *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 OECD (2002a).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Domestic Challenges*. Paris: OECD.
- OECD (2002b). *Regulatory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From Interventionism to Regulatory Governance*. Paris: OECD.
- OECD (2003). *Review of Financing and Quality Assurance Reform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is: OECD.
- OECD (2005). *China in the Global Economy: Governance in China*. Paris: OECD.
- Oi, J. C. (1989).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Oksenberg, M. (2001).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Challen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China Journal*, 45: 21 – 35.
- Pearson, M. M. (2005). The Business of Governing Business in China: Institutions and Norms of the Emerging Regulatory State. *World Politics*, 57 (2): 296 – 322.
- Pearson, M. M. (2007). Governing the Chinese Economy: Regulatory Reform in the Service of the State. *Public Administrative Review*, 67 (4): 718 – 730.
- Pei, M. (2002). China's Governanc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81 (5): 96 – 109.
- Pei, M. (2003). Contradictory Trends and Confusing Signals.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1): 73 – 81.
- Pei, M. (2006).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ierre, J. Ed. (2000). *Debating Governanc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lanyi, K. (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 Pye, L. W. (1995). Fac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Guanxi: Paradoxes in Chinese Administrativ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The China Journal*, 34: 35 – 53.
- Salamon, L. M. (2002). The New Governance and the Tools of Public Action: An Introduction. In Salamon, L. M. Ed.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A New Guide to the New Governanc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ambaugh, D. (2001). The Dynamics of Elite Politics during the Jiang Era. *The China Journal*, 45: 101 – 111.

- Shambaugh, D. (2008).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toker, G. (2000). 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 In Brown, B. E. Ed. *Comparative Politics: Notes and Readings*. Fort Worth: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 Symposium: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2003).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1): 6 – 81.
- Symposium: Will China Democratize? (1998). *Journal of Democracy*, 9 (1): 4 – 64.
- Tam, W. & Yang, D. (2005). Food Saf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gulatory Institutions in China. *Asian Perspective*, 29 (4): 5 – 36.
- Tanner, M. S. (1999). *The Politics of Lawmaking in Post-Mao China, Institutions, Processes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eiwes, F. (2001). 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a Journal*, 45: 6982.
- Waldron, A. (1998). The End of Commu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9 (1): 41 – 47.
- Wang, J. (2006). State-Building as Market-Building in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7 (2): 209 – 240.
- Wang, S. (2003). The Problem of State Weakness.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1): 36 – 42.
- Wang, S. (2006). Regulating Death at Coalmines: Changing Mode of Governance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5 (46): 1 – 30.
- Weber, M. (1969).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T. (1990). Post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in China: The One-Child Policy Reconsidered. *World Politics*, 43 (1): 53 – 76.
- Wong, L. & Flynn, N. Eds. (2001). *The Market in Chinese Social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 World Bank (2005). *China: Deepening Public Service Unit Reform to Improve Service Delivery*.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 Yang, D. (2001). Rationalizing the Chinese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vernment Reform. In Chao, C. & Dickson, B. J. Eds. *Remaking the Chinese State: Strategies, Society, and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 Yang, D. (2003). State Capacity on the Rebound.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1): 43 – 50.
- Yang, D. (2004).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ao, S. (1998). Three Scenarios. *Journal of Democracy*, 9 (1): 54 – 59.
- Zheng, S. (1997). *Party vs. State in Post-1949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eng, Y. (2004).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u, S. (2004). Reforming State Institutions: Privatizing the Lawyers' System. In Howell, J. Ed. *Governance in Chin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责任编辑: 陈小就)